

返本与开新：中国武术原典诠释基本问题论绎

张震¹，李秀红²

(1.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0241; 2. 沧州师范学院, 河北 沧州 061000)

【摘要】：从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和返本方能开新的历史规律出发，武术研究应具备原典精神，以原典为基、用原典说话。武术原典是记录和书写武艺之圭臬和絜矩的原发性和原创性经典，是以武术技艺原典为本，以文化原典、历史原典、军事原典、哲医原典为其思想源头、训练理念和术语基础的文化系统。研究回到原典，能够让武术不再“失语”和“他者化”，为武术教育教学和文化传播提供元训练理念和元术语。武术原典包含：武经和武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整体。原典蕴藏了“劲力为体，攻防为用，体用不二”的元视域，涵摄了“阴阳并建错综”的元逻辑，能够在中国经典解释学的系统下，衍发出以“身意”和“躰知”阐释典文的基本方法：始于“释言”，经由“构形”、“诠释”、“著意”，至于“躰道”。

【关键词】：武术原典；元视域；元逻辑；元训练理念；武术教育；武术传播

【中图分类号】：G8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19)02-0048-1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1]，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是我国当今最重要的时代主题，而创新和创造离从来都离不开文化的根源，因而要“不忘本来”地去“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武术作为传统文化中最具表达性和显性的因子，其研究同样应当秉持“返本开新”的精神，返本的目的是开新，开新的前提是返本。近年来，中国哲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研究界掀起了一股通过“回归原典”而复归中国自身的元视域、元逻辑和元方法的潮流。在崇尚文化自信的当代背景下，回归原典、返本开新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武术回归中国自身的解释话语、思维、技术术语和方法必然是大势所趋，武术研究也应建立起原典意识和精神，以原典为基，用原典说话。那么，武术原典的所指是什么？回归原典的意义何在？基于原典的研究都包含哪些维度？这是本文所要着力回答的设问。

1 武术“原典”的基本意涵与研究意义

1.1 武术“原典”的意涵

学术研究从来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中国传统武术的整个理论体系一方面建立在古典哲学和医学的思维模式、范畴和术语系统之上，另一方面是由历代武术家用自己最切身的长期技击体验书写而成，两方面相辅相成，不可割裂而论，共同构成了中华武术的“原典”体系。

收稿日期：2018-1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传统武术“即象即身”的哲学认识论研究（项目编号：18CTY002）。

作者简介：张震（1985-），男，山东淄博人，哲学博士，体育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武术哲学、身体哲学。

通讯作者：李秀红（1981-），女，河北沧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运动训练理论创新与实践研究。

所谓“原”即：“元也”，《说文解字》释曰：“始也，从一”^[2]，意为“初始”，《尔雅·释诂》亦有：“初、首、基、肇、祖、元、胎……，始也”^[3]，《公羊传·隐公元年》亦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意为“始时”。“典”者“五帝之书”，《尔雅·释诂》解曰：“经也”，《广韵》释曰：“法也”，《尚书·注》曰：“五典，五常也”，《秋官大司寇·疏》曰：“常经即是法式”^[4]，即是说，“典”包含了“经”、“常法”、“常经”之义，是编辑成册的正式书文。因而，“原典”的含义就是“最具原发性和原创性的记录和书写根本大法、絜矩之道或规律的书文”。更为重要的是，“原典”又不仅仅限于“时间点”上的“元”创发，更不是“死的文本”，而是在历史大浪淘沙中传承和留存下来的，可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和充分启迪后人的经典。此外，原典之所以是“活的”，还在于其始终不断地被后人诠释着、应用着，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和发展出很多的技艺知识分支，如：以《九要论》为纲，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等都发展出了各自的“要论系统”。

对中国武术而言，既然其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充分吸收古典文化和历代武术家切身体认的知识积累而生的多重作用结果，传统武术的原典则相应地由以下几个层面构成：

(1) 直接记录最初武术或与武术相关活动的原始典文，如：《礼记》、《周礼》、《仪礼》、《论语》等，其中关于军礼（如射礼、鬻军礼、雉礼等）的部分，《诗经》、《礼记》、《周礼》中关于舞武（大武、大濩，等）的部分，《尚书》中关于战争（戎）和祭祀（祀）的部分，《春秋三传》中关于军事和国家战争的历史记载，等等。

(2) 直接为武术提供思维方法、术语系统的相应中国古代哲学和医学原典，如：启迪和奠定各内家拳术理论的道家原典《道德经》、《庄子》、《淮南子》等，道教经典《周易参同契》、《黄庭经》等，儒家经典《中庸》、《太极图说》等，又如：为武术的元范畴“气”提供理论基础的《周易》、《孟子》、《管子》、《黄帝内经》等。

(3) 作为武术技艺理论与方法论思想源头的军事原典，如从最初讨论国家规模作战的《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孙子》等，到宋代的《武经七书》、《武经总要》等原典（及其中所收纳的古原典），到明代的《纪效新书》、《武备要略》、《阵纪》中有关军团作战技术和训练方法的经典等。

(4) 旨在记载、传播和探讨作为个人技艺的武艺（俞大猷谓之曰“一人之斗”）训练方法、技战术技巧和修身方法论的原典，如：《纪效新书》、《武备要略》、《阵纪》、《武编》等中间个人武艺的部分，以及《剑经》、《内家拳法》、《拳经》、《手臂录》、《无隐录》、《少林棍法阐宗》、《九要论》、《太极拳论》、《中气论》等武术原典。

那么，武术原典的这些组成部分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作为人文活动，武术虽然在先秦的文献中就已经被大量记载，但先秦文献或者只是把武艺作为事件记录，或者是从国家统治者和将领的视角对“综合战争技术”（包含军团作战、后勤、外交）所作的记载，真正将武术技艺本身的训练方法、技巧、修炼方法作为书写对象已到汉代，而形成专门的武术理论典籍则晚至明清时代，如此来看，我们首先需要分析“武术”的几层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分的含义，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其原典的确立。

首先，如果我们将传统武术作为文化事物来研究的话，其原典则可在时间点上追溯到中华文化经典倍出的轴心时代，无论是早期的“五经”，还是秦汉诸子的著作中，都能找到一鳞半爪与“武”相关的记载，如《庄子·说剑》在寓言中对剑道的洞见，又如史学著作《吴越春秋》在记事和记史之外对剑术技法原则的精辟阐释，其中“内实精神，外示安逸”^[5]一句成为之后诸流派武术临战御敌之圭臬。从历史文化事件角度而言，这些记载是最具原发性的，但其核心意旨或为记史、或为载礼、或为明理说道，皆非以武术技艺为根本意旨，换言之，以此作为“原典”的前提是将武术作为历史学、文化学、哲学的个案、对象和研究分支而言的，本质上是“有关武术”的“文化原典”、“历史原典”。

其次，由于我国古代没有发展出将人体对象化和物理学化的自然科学，因而传统武术在探讨作为击技主体的身体知识时，所使用的是深具切身性的、取自古典哲学和医学文献的术语系统和

内观方式,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范畴:阴阳、太极、八卦等,可被身体内在体验的范畴:气、心、意、神等,由解剖、身感和取象类比三重意涵构成的五脏、筋脉、丹田等。这些范畴皆广泛应用于武术修身、训练和创发的过程当中,是古代中国人对以技击为核心的武术所进行的“身体运动的哲学阐释学”,其中内涵了整体论、系统论和身体自组织论的智慧。然而,像“五经”、“四书”《黄帝内经》、《道德经》等这类哲医原典虽然为传统武术奠定了阐释身体自身和身体运动的术语系统、思维模式及解释学基础,但其实质上也是“有关武术”的“哲学原典”、“理论原典”。

再次,武术技艺与军事技艺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军事技艺虽然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人之斗”的技艺不同,重在士兵的集体训练模式、大军团作战方法、队列布阵等,但后来个人技击术的核心战略、战术思想和基本战斗技法却基本上脱生于战场,例如内家拳术的很多核心力量(丹田劲)、攻防技击思想、训练方法、身形技法和发劲方法是基于长枪和棍的,如俞大猷的《剑经》所言:“自一人以至百千万人,同一法也”^[6],一人之斗的技法与军团战斗道理相通。反过来,拳术又是军事训练的基础之一,程子颐的《武备要略》就有“各艺身法皆出于拳,知拳则能活脱手足”^[7]。但军事技艺由于重在“集团性”的合作运动,因而与用于个体搏斗的技艺仍有很大差异,譬如:在战场上士兵所使用的枪主要是用来冲击敌军方阵的,长度最长可达七米,技法非常单一,这与武艺中技法灵活、身法多变的枪术在表达形态、训练模式、技法结构上都很不相同,其它的兵器器械也有类似特点;又如:在士兵选材上,军队最忌伶俐聪慧之人,戚继光认为应选择乡野愚钝之人,因为他们“畏官府、畏法度、不测我颠倒之术,诚信易于感孚”^[8],易于调配,适于集团作战,这与武艺授徒的原则又极不相同。因而,军事原典与武术原典虽有一定的“模糊相似地带”,但也不全然相等。

真正属于作为“武学技艺自身”的原典,应当是以个人主体的武技实践为根本的奠基性文献。这就如同哲学虽为心理学提供了术语系统、研究方法和问题域,但心理学逐渐独立形成了有自身研究对象、命题中心的学科和拥有自身基础性的原典一样,前三类武术原典是传统武术的“意根”,无此三者则武术难以成为一种文化和思想,亦难以形成系统化的修身、技击和进道的高级理论。同样,“武学”也具备自身的研究对象——技击技艺——攻防等,如《少林拳谱杂俎》(以下均简称《杂俎》)所言:“拳术之至胜者,在于技击之精战(湛),技击乃术之根本,……拳法之用,重于整劲,如矢之离弦,其透于身也”^[9]。因此,武学原典应以武术技艺原典为本,以文化原典、历史原典、军事原典、医学原典、哲学理论原典为其阐释学方法和工具,共同构成传统武术的原典研究体系。

1.2 作为原典的“武经”与“武论”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古典哲学划分为“子学时期”和“经学时期”,佛教原典也被划分为“经”与“论”,其实质相同,皆是原典分为“原创性经典”和“诠释性经典”(或“延伸、发展性”)两类,如:“经”就是释迦摩尼本人所创说,而“论”则是阐释者对释氏思想的衍伸阐释。对于武术的原典,我们同样也可以采取相似的划分方法。那么,如何确定武学的原典,又如何将其分为原创性的“武经”和阐释性的“武论”呢?

原典创作时间的先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划分“武经”和“武论”的依据,从汉代开始,出现了具体记录私人格斗技法的典籍,《汉书·艺文志》列有《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其中就有用武之大法:“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又:“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也”^[10],此中对“阴阳”、“形势”、“变化”、“后发先至”等的记述为后来的武术典籍吸取和应用,如果《艺文志》所载诸篇未佚亡的话,这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武经”了。事实上,这些早期的武学原典不仅应是在创作时间上具有优先地位,更应是在技艺理论原创性的时间点上具有“武经”的意涵。

即是说,称得上是“武经”的原典除了时间上的先,更重要的体现在其理论的原创性、普适性和对后世的影响力,这一方面表现为被后世诸拳论引用、阐释和深化发展的程度、实践应用的广

泛程度和是否被奉为圭臬;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具备一定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我们当今能够看到的专门成书的武术经典大都始于明代,这一则是由于明代中晚期的商品经济及其所伴随的图书业的发达,二则由于持续多年的抗倭战争主要是小规模战场作战,促进了战场武术向个人搏击术的转化,再一方面就是历史较近,典籍保存更易。因而明清是武术原典产生最为重要的时期,俞大猷的《剑经》、唐顺之的《武编》、程之颐的《武备要略》、吴殳的《手臂录》、曹焕斗注释的《拳经》等皆为后来的各个民间武术流派的拳理、拳法的创发奠定了最为核心的絜矩之道,均可称得上是“武经”,之后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原典则可称“武论”。例如:明末清初诞生于中原大地的太极拳、苌家拳、少林拳系,其无论是拳谱名称、技法核心还是历史源流都与戚继光、俞大猷等的思想紧密相关,根据其发生的历史时间顺序和谱系,这些民间原典皆可谓之曰“武论”。

当然,“武经”和“武论”的划分必然具有较大的模糊性,甚至是见仁见智的,它既包含了历史谱系意义上的发明与继承关系问题,同时也内涵有武术义理的理论辩证问题,譬如《太极拳论》中军队武技的思想就已经不见踪影,更多地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对劲力应用如何出神入化;而从太极拳的整个创发和传承谱系角度而言,《太极拳论》实质上又具有“拳经”的地位。我们之所以提出武术原典“经”与“论”的划分,并非旨在严格区分两者的地位,而意欲强调做研究时不应忽略武术原典的构成关系和原典之间的谱系关系,为武术原典的确立提供一种分层研究的标度。

1.3 武术研究回归原典的重要意义

武术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它不应被现代性和资本简单地拆解为擂台搏斗术,武术人也不应被运动生理生化和生物力学对象化为物化指标和机械杠杆,也不应该将武术作为西方某种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理论和话语系统中的某一研究个案,它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根本上就是原典精神和原典意识的缺失。在未深阐类似《剑经》、《手臂录》,未反复研读和阐发《太极拳论》等原典之前,套用几个西方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理论,就开始大谈武术当代化、武术进校园、武术国际传播,并自以为有所“创新”,带来的只可能是武术更大的危机。

具有返本开新精神的武术研究,本就应当根植于古代武术家为我们留下的原典文献,并以此为基,从观念的根源处深研,从而衍发出一切中国武术自身所具备的元问题域、元范畴、元方法……,譬如:唯有把武术“气”这个元范畴阐释清楚,与身体认知相应,才能够在武术传播(尤其是深度跨文化传播)中让学习者可以真正理解和接受武术的独特性和魅力,如果这些元范畴都是泛化的、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谈武术传播甚至国际化,乃至深度国际化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回归原典,秉持原典意识,这样才能真正固武术传统之根本、浚武术发展之泉源,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当代武术所面临的危机,一方面是来自西方现代竞技体育文化的挑战,这种挑战使得中国传统武术被大众狭隘地理解为擂台上的搏击运动,加上武侠小说、武侠电影的过度渲染,以及某些自称的武术“大师”和传统武术本身所包含的神秘主义,导致民众将他们幻想中的武术与擂台上的“无敌”联系起来,其实质是中国武术的问题域和表达方式被削足适履地西方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来自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挑战,虽然运动生理生化学、生物力学对武术研究的意义重大,但若完全以此为研究的核心范式,将使传统武术彻底祛魅,而人不是机械、不是客观物体,如果完全摒弃古代武术家以其毕生体验书写下的“一口真”,中国武术也只会落得成为一具与任何搏击术无所区别的躯壳;再一方面,来自西方社会科学范式和术语的侵袭,这种侵袭是最具挑战性的,因为它是直指话语惯习、文化样式和思维模式本身的,作为人文存在,武术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其话语和术语系统与身在其中的中国人相连接,整个武术教育、传播、文化认知都建立在这套系统之上,因此,对话语和术语的取代,更深一层就是对文化样式的解构,继而对整个思维模式产生破坏。

因此,回归武术原典是消解传统武术危机最为重要的手段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下”的精神,“在指导

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1],立足中国和挖掘历史是本,返本方能开新,回归原典才能应对现代性给武术带来的危机,这其中包括:(1)能够回应西方现代竞技擂台文化和资本运作的挑战,在技击根本的问题域和身体运动的话语表达方式上与西方的搏击训练学和训练理念形成对举;(2)能够真正呈现出中国武术文化的深厚底蕴,继而在社会资源方面,调动起一切传统经典解释的记忆与形式,唤醒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精神和对中华运动文化的热情;(3)能够在阐发武术原典之义理和凝练思想过程中,为当代我国武术教育教学和文化传播提供更具澄明性的解释基础和系统化的训练方法,形成可与西方搏击并举的体系化理论和方法论模式。

作为集技击、修身和养生为一体的武术,它原典中所载的理念、方法和范式未必是最高效的和绝对普适的,但一定是历代武术家根据切身的体验和毕生积累,从中国语言的基因和血脉中汲取的最能切中身体经验和启发后代习武者知觉运动的语词、话语和术语。这种创发的方法是从“活的身体运动”出发的,因而深具细腻性和微妙性,有些拳经、拳论甚至将运动时身体内部的几微之动也阐发出来,武术的“气论”就是典型的代表,无论是呼吸升降、还是内在劲力的流动不滞、抑或是意识的神化不居,都被以“气动”之象的方式捕捉了下来,留存为典籍。又如:与西方搏击以肌肉训练为本相异,中国武术训练的核心——“筋”作为劲力弹动和屈伸之本的“原象”,与劲力传递的脉络(筋脉)、气动、脏腑(肝)、神意皆有密切的辩证关系,是内景返照和以身观复才能获得的运动体验^[12]。因此,唯有回归原典才能发掘出这些中华武术技艺的特质,继而让研究回到技艺本身。

2 武术原典孕育的“元问题”

既然传统武术的原典深刻蕴含了属于中华文化自己特有的身体感知、运动体验和技击方法,那么其中自然包含了中国武术技艺特有的“元视域”和“元逻辑”,而回到原典、回到技艺本身从根本上也即是回到这些“元问题”的阐释中来,这才是武术一切研究的发端处。

2.1 武术原典“劲力为体”、“攻防为用”的元视域

武术之谓武术,就在于其无论时代的需求和社会形态如何变化,其作为技击术的根本特质是恒有的,这一点是强调武术文化化的学者、强调武术技术化的学者、强调武术审美化的学者的共识。因而,无论是作为战场搏杀的技击、擂台搏斗的技击、还是意象表达的技击、抑或是审美表现的技击,其体现在武术原典中,皆包含了两个基本元视域:(1)作为“体”的“劲”和(2)作为“用”的“攻防”,武术家刘奇兰先生说:“(形意)拳术之道,体用莫分”^[13],“体”既指“练己”之周身一体的整劲,又指武术技艺基础和絜矩之道的“本体”,亦指认知主体——身体的本体感受,如:体味、体知、体认等,《集韵》因而写作“躰”^[4];“用”即练攻防一体的对战技术,此二者一静一动、一内一外,体用一道,所以“静为本体,动为作用也”^[14]。而任何与一种具备学科特征的研究,皆应拥有属于自身的基本命题,“躰用具备”的核心视域,使得武术可称得上是“武学”、“拳道”,因为它涵盖的范围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体育学,借郭云深先生的话说,拳术之道“数理兼该,性命双修,乾坤相交,合内外而为一”,是一种在“用躰”中亲身实践着的“身体哲学”、“体认哲学”。杨祥全教授更是将此实践活动,称之为“以武入哲”的生命体认^[15]过程。因而可以说,传统武术的原典即是围绕着“体用同源”而“显微无间”的。

《杂俎》曰:“能通达于整体者,谓之劲”^[9],“劲”既意指功夫技艺的本体论基础,又指的是一种周身一气、上下贯串的整体化躰感,即所谓“遍身具有力”^[6],武术原典中的元理论视域本质上都首重于“劲”。戚继光《纪效新书》的“八母枪”练法强调“三尖”,认为“身合”与“相照”是枪术的根本,三尖不照是枪之大病,所以“必上照鼻尖,中照枪尖,下照脚尖”^[8],后来的形意拳、八卦拳等也无不强调三尖相照,因为它是使得人身整体化一为“劲-躰”的重要原则。《手臂录》所载的“六家枪法说”有“用在两腕,臂以助腕,身以助臂,足以助身,乃合而为一”^[16]之“合劲”论,强调周身相合为“一”。《九要论》的“首要”即为“一贯”,“从上至足底,内有脏腑筋骨,外而有肌肉皮

肤、五官百骸,相联而为一贯者也,破之而不开,撞之而不散”^[17],此即“劲”之本意,二要之“呼吸浑然如一”和“意气力相合”,三节、四梢、五行、六合、七进、八身、九步,本质上皆指向同一视域——整体之“劲”,《拳经拳法备要》也强调“身步稳,百骸筋骨一齐收”^[18],亦是直指整体劲,因为一旦劲散,则所谓动静、进退、疾缓、虚实、屈伸、刚柔和一切武势皆无所作用,即便是“四两拨千斤”之“四两”亦是整劲,“以柔克刚”的“柔”也是整劲之柔,粘连相随也是以劲整为基石的运动。此外,各派武术原典中皆重的“练气”理论,本质上也是借用了“气”不可分割和流动不滞的整体性意象,因为“整”靠的是力传递的无所阻滞。即是说,在本体意义上而言,传统武术原典的诸论皆不跳脱出“劲”的元视域。

体不离用,即“劲”不离“攻防”,“劲”为本体,“攻防”为作用也,无“劲”则“攻防”之术无非纸上谈兵,同样,“劲”之所以是“活动着的劲”,就在于其中有攻防之意、攻防作用。《杂俎》将“劲”分为“刚柔、虚实、直横”之相辩证的“六劲”,又提出了“踩、扑、括、束、搓”之“五劲”,不难见得,这些“劲”意旨“攻防”。吴殳在《手臂录》中提出枪法之用在腕,“两腕封闭,阴阳互转,百法藏于其中,神妙莫测,为枪之原神”,其中“封闭互转”、“大封大劈”的阴阳之用即为“攻防”,但这一藏于两腕中的攻防是以“臂之高下伸缩”为助劲的,而臂之伸缩又是以“足以助身”^[16]为根的,可见攻防中所蕴含着的以足为根、节节贯串的整体性劲力之蕴。实质上,类似“三尖相照”、“一身备五弓”这样对“劲”的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描摹,其中都函攻防之意,形意拳“三体式”的三尖相照就蕴含着上、中、下协同攻防的意义,在空间上让对手上下皆难相顾,是打“空间差”的良法。“体用”本就一如,一切劲法皆含攻防,所有攻防即为劲法,唯别于动静而已,即:静时为“劲一静”,动时化作“攻防一用”。

质言之,武术原典阐释的回归,其元视域和核心问题域皆在于“劲”与“攻防”的体用同源,在于其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身体运动关系,这种所谓“朴素的辩证法”,在中国哲学体系中有更加精道的表达方式——乾坤并建、错综合一。

2.2 武术原典中“阴阳并建错综”的元逻辑

阴阳的“并建”和“错综”是从最初的武术原典开始就呈现出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元逻辑。乔玉成教授^[19]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中华武术基因库”中所提取的与技击直接相关的因子中,包括了刚柔、虚实、动静、攻防、进退、奇正、横直等要素,这些要素都符合“阴阳并建错综”的元逻辑。阳者乾道,阴者坤道,阴阳并建亦曰乾坤并建,即:阴阳互具胥有、摩荡生化的意思,更重要的是,阴阳二者“时无先后,权无主辅”,所以谓之曰:“并建”。明代大哲王夫之说:“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并立,则《易》之道在。”^[20]举例而言,攻与守就无先后和主辅之分,李小龙的“截拳”就是典型代表,攻防两者是同时发生、相互生化的。看似是一个纯粹攻击的动作(阳),实质上防守(阴)就藏在其中,无论在枪、棍还是拳术的典籍中,“不招不架”都是常用术语。同样,像奇正、动静、虚实等范畴莫非如此。

通俗的解释方法,无非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太极图那样“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但实际上“乾坤并建”所蕴含的元逻辑之设问:阴阳何以生化无穷?通俗的阐释是不究竟的。我们能够在卦象中见到纯阳之乾卦和纯阴之坤卦,在武术技击中也似乎能看到纯粹的进攻动作和防守动作,但这皆为假象,“乾坤并建”的精要在于“藏”与“显”的并存,表面纯阳的背后是藏有纯阴之坤的,不招不架的内里是隐蔽有防守之用的。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武术技艺翕辟成变、变化万端的前提就是阴阳的并立对峙、氤氲摩荡和冲气合一的运动过程,实脚中若不藏虚,身体则根本动不起来,刚用中若不蕴柔,则僵滞无劲,阴阳并建是“身体动力”,也是“身体运动变化”的根本来源。以奇、正这对范畴为例,《心意拳谱》曰:“正,是直也,中也。过阴不及,过阳不力,看斜是正,看正是斜,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相生,方为之正也。”^[21],一身之中,斜正一如,触之则变;孙禄堂亦云:“奇无不正,正无不奇;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之变,如循环之无端,所用不穷也。”^[22]奇与正的互具、相峙、藏显所产生的“身体动力”就是基于阴阳并建的基本逻辑。

阴阳并建揭示了“何以生化”，而更重要的是“何以无穷”，《拳义述真》中所谓“奇正之变”的无端和不穷仅靠阴阳的并建逻辑就不够了，还有一层“错综合一”的逻辑。“相错”与“相综”滥觞自《易》，《系辞》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孔颖达疏曰：“错谓交错，综谓总聚，交错总聚，其阴阳之数也。”^[23]简言之，错综即：(1)纵横交叉；(2)相对相杂；(3)交错配合；(4)总聚合一之意。武术原典中处处以此为逻辑总纲，并将此具身化为身体运动的逻辑。《易筋经》在讲到“气”与“筋”的相互关系时，就有：“此所谓参互其用，错综其道也。”^[24]即“气动”与“筋活”二者既相参互证，又互有错综；《意拳拳学》亦有：“三劲成体，六力错综”^[21]，点明了劲力必由错综而发的本质；顾留馨在《太极拳术》中对《太极拳论》“着熟”的阐释中也提到每一拳势的攻防方法和变化方法之“错综互用”^[25]。

人体既是一套整体化的阴阳并建之系统，整体中又寓有各部分之阴阳错综运动，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的阐释尤为细致，以白鹤亮翅一拳势为例，“此势以左随右，上下皆然，但引而不击，得下坤卦之柔，上卦坎之刚，中意故取‘比’上下相随。”^[26]

武术的阴阳是“系列对立统一范畴的‘通变’称谓，两者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通互变’的”^[27]，三才、四象、五行等都是在通变中演化出来的。王弼曰：“‘通其变’者，由交错总聚，通极其阴阳相变也”^[23]，即是说“通变”的本质力量即是“错综合一”，而错综的前提是阴阳的并建存在，正如王船山所说：《易》之大要莫非“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20]，武术原典中对技艺之体用的记载也正是以此逻辑作为根本思维模式的。因此，以武术原典为根本的研究，针对元逻辑的探赜是极为重要的。

3 武术原典的阐释学方法

3.1 武术原典研究的基本方法

武术的原典研究离不开好的方法学，我们目前的武术研究更多是使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论，而回归原典不仅是要回归其元视域、元范畴和元话语，最为重要的回归我们中国阐释学的元方法论。这种回归并非是彻底摒弃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而闭门造车，而是通过回归，形成一种可以与其相对举的思想工具。

仅就针对文本本身的研究方法而言，武术原典的研究与其它中国文、史、哲古典文献的研究相较并无特别之处，主要分为：(1)文本、文字和语义的基本校订(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和解释(笺疏、训诂等)；(2)思想史；(3)哲学阐释学(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疏义、格义穷理等)三种^[28]。此三种方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互不相离，没有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笺疏和训诂的保障，则后面两种方法就是空中楼阁；缺乏思想史背景的梳理，文本的校订和意义的阐释很可能是当代人基于其思维前见的曲解，哲学阐释也可能只是自说自话的海市蜃楼；而没有了对文本格义穷理追问的方法论，研究就成了干枯无意义的材料堆叠，此即在方法学上的“文史哲三元一体”。

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论，仅就文本的基本校订、解释和思想史背景梳理的方法而言，武术原典研究实际上就是中国古典文史学研究的一个小的分支和案例对象，武典是卷帙浩繁的古典文献中的一种。然而，武术典籍的特殊性在于，它本质上是与身体技艺紧密连接的，其中的每一个文字都凝聚着书写着的切身经验，以及这种经验与文字之间的妙合；反过来，好的读者和阐释者又是激发和著显文字背后所隐之一身知觉运动的功夫实践者，这种身体义理的格致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史哲方法所能及的，武学之所以成为武学，诚如艺术学成为艺术学、建筑学成为建筑学一样，也正是由于它的原典研究中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论——技击技艺的身体阐释学方法。

3.2 武术“道一意一象一形一言”的身体诠释方法

自汉代开始中国古典思想进入了经学诠释阶段(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经学时期”)，至魏晋，这种诠释学已经演化成为方法论层面的“研究方法”，到了宋明理学，更是将此方法演化为了深度阐释义理的“格义学”。虽然，从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中发展出来的经学诠释学方法有所差异，如魏晋玄学重在集注、疏义中阐释思想，宋明理学重在具体的命题论证中格义明理，但其根本意旨

所在皆为对经典实施意义阐释。对于武术原典而言,这些属于中国自身的哲学诠释方法也同样适用,但有所差异的是,对武典的阐释,不仅仅要释其文字所含之义理,更要让“身体知”这些义理背后潜藏着的技法,这即武学中除了实练之法以外甚为重要且自有的研究方法——身体阐释。

既然武学原典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有继承和相通的关系,那么我们首先就要阐明,中国的哲学阐释学方法究竟为何。当代中国哲学家林安梧、刘笑敢等,在总结魏晋和宋明哲学方法时提炼出了“道一意一象一形一言”^[29,30]的中国经典诠释学循环模式,即是说,无论是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疏义还是格义穷理,其根本上都是由“言”定“形”、“形”以成“象”、取“象”得“意”、尽“意”体“道”的方法,是以“言”昭显和发明“道体”的过程。武术的原典阐释,同样也应遵循这样一个诠释模式,但根本的差别是,这个解释循环是由“身”直接和亲自参与其中的,身体自身即诠释主体,而不像中国哲学和文学那样,虽然强调身体阐释,但却只是间接性的“身体隐喻”、“身体符号”。这就凸显出了武学原典阐释相对独立于文史哲的方法论。

即是说,武典的“言”所定之“形”是实在的“身形”、“动作之形”、“势之形”(而非言语所构之形),而这个“形”又不是简单的固定姿势,因为如《手臂录》所言“行拳不可有势,势乃死法,存于胸中,则心不灵”,“形”的根本在于其中随机、随时而易的技艺,这就需要诠释者抓住“形”中之“象”,在想象、喻象、象征的随机摄化中体认其中之义,《杂俎》云:“手似药箭,身似弓弩,消息须要后脚蹬。此箭引喻最切要”^[9],也就是说,以“喻(象)”来“(接)引”是最为“切”中身感之要的,而且是可以随着情境变化而变易的。《太极拳著解》曰:“当其未发,构形之时,看其意象什么形,即以什么命名。亦随意拾取,……是时即形名之谓‘著’。而每著之中,五官百骸顺其自然之势”^[31]。此段所言,极为精辟地道出了武术阐释(宋明理学称“阐释”为“著明/著显”)中“形”、“象”、“意”的内在关系。“构型”是当“时”发生的,当时即“意象”的创生过程,“意”在“象”中,随“时”取“意”,是时即形,正如《易·系辞》所言:“变通者,趣时者也”,“时中趣意”,周身皆无不显现其最为自然的形态,这便是武术身体阐释的方法——“著”的精要所在。

纯任自然是武术最为崇尚的“道”,《拳义述真》所说的“拳术上乘神化之功,有不见不闻之知觉,……要动而后觉,是先天动;不可知而后动,知而后动。”^[14]所谓拳术上乘之“神化”与一般知识论意义上的“先知而后动”大相径庭,其所追求的是复归于“先天动觉”的能力,即“功夫入身”,这也是“身体阐释”最具终极性和超越性的目标指向,它始于“释言”,经由“构形”、“诠象”、“著意”,至于“体道”,整个过程都需要身体直接切入,处处“体认”,如《剑经》所谓:“凡此意味,体认得真”^[6]《浑元剑经》所言:“故剑法既成,……在一番体认知改择中,卑以身处之心”^[32],《拳道中枢》所语:“参以学理,证以体认,祛其蔽,发其密。”^[33]

武术直接性的“身体阐释”意味着“体”与“用”的一源不离,原典文本的诠释必须接通身体的知觉运动感,让身体“知”,甚至可以说是用身体直接阐释文本,是“身、境、识俱显”的瞬间过程,而非囿限于纸面上的解释是否准确。换言之,其方法为“身注武经”与“武经注身”的互藏为宅的循环。郭象曾以“寄言出意”来概括经典阐释,所谓“寄”,即“托也”(《说文》)、“寓也”(《增韵》),稽康《琴赋》有:“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34]孙绰有“庄子多寄言,混沌得宗象”之语^[35]。“寄言出意”实质上就是“寄旨于言,而在出意”,其重在“出意”,而武典阐释之要,更在于出意——出“身意”。此“身意”不出,我们往往阐释不清,很多拳势字面上的意思和演练出来的招式,根本上藏着枪术、棍术、盾牌术的“训练方法学”;此“身意”不出,我们也无法真正了解:一些像“耍(耍手,则以手领身)、“耍拳”)”字这样的方言中藏匿着的身体运动智慧,一些像“硬棚摘豆角”(本意为形意拳伸缩的身姿像是在棚子里头一伸一缩地摘豆角,但被误传为“硬碰摘豆角”、“磕碰摘豆角”这样于情于理皆不通顺的话)这样的拟语所蕴藏的本来样貌;此“身意”不出,我们亦无法真正理解“龙形猴相”中所寓意的“大伸大缩”的基本原则和身体意识。因此,“寄旨”于武术家们所留下的典文之“言”,而“出”其所蕴藏的“技艺之意”和“身感之意”,探赜其中的幽隐的运动机理,由文本接引技艺,由技艺反照典文,继而由“身技”进“身道”,这才是武学原典诠释学方

法的旨要。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36],而“文化自信”得以可能,就在于“立足原典”、“以原典为纲”、“以经典为宗”的精神与方法,一切不从传统武术原典自身出发而随意套用西方术语、方法、理论的研究皆是无源之“空纠”。我们武学研究者应具备深刻的原典精神,并以武术技艺原典为本,以文化原典、历史原典、军事原典、医学原典、哲学理论原典为其阐释学方法和工具,共同构成传统武术的原典研究体系。回到原典,能够:(1)不再“失语”和“他者化”;(2)回应西方竞技擂台文化和资本运作的挑战,在根本问题域和技术话语表达方式上与搏击文化理念构成对举;(3)呈现出中国武术文化的深厚底蕴,调动起一切经典解释的记忆与形式,唤醒国人的文化精神和对武术的热情;(4)在阐发中,为武术教育教学和文化传播提供更具澄明性的解释基础和自有的训练方法。对原典的疏离是我们当代武术发展问题的症结和根源,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回到原典,方为正道沧桑。

参考文献:

- [1]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N]. 人民政协报,2018-01-13(04).
- [2] [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4:1.
- [3] 尔雅[M].管锡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1.
- [4] [清]陈廷敬,张玉书,编撰.康熙字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9,1419.
- [5] 马国兴.古拳谱阐释[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5.
- [6] [明]俞大猷.剑经[M].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上卷.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19;20;22.
- [7] [明]程子颐.武备要略[M].马力,汇编.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上卷.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80.
- [8]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M].范中义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
- [9] 少林拳谱杂俎[M].马力,汇编.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下卷.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107.
- [10]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1758-1759.
- [11] 新华网.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EB/OL].[2016-08-0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03/c_129201126.htm.
- [12] 张震.传统武术“易筋”的身体训练哲学[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10):60-65.
- [13] 薄家骢.意拳述要[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9:202.
- [14] 孙禄堂.孙禄堂武学集注(拳意述真)[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178;282.
- [15] 杨祥全.中国武术思想史[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41.
- [16] [清]吴旻.手臂录[M].马明达,马廉祯,编.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从编(第五册).济南:齐鲁书社,2015:3558;3559.
- [17] 李涵波.心意六合拳[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54.
- [18] [清]张孔昭.拳经拳法备要[M].曹焕斗,注.马力,汇编.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下卷.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42.
- [19] 乔玉成.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基因谱系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12):122-132.
- [20] [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周易内传[M].长沙:岳麓书院,2011:12;41.
- [21] 王芑斋.意拳拳学[M].刘涛,李全有,整理.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39;67.
- [22] 孙禄堂.孙禄堂武学录[M].孙剑云,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291.
- [23]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注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365.
- [24] 周伟良.《易筋经》四珍本校释[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249.
- [25] 顾留馨.太极拳术[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333.
- [26] [清]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卷一[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4:19.
- [27] 金玉柱.中国武术“起承转合”的思维方式与运行逻辑[J].体育与科学,2018,39(3):107-113.
- [28] 赖贤宗.道家诠释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7.
- [29] 林安梧.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04-117.

- [30] 刘笑歌. 诠释与定向: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60-69.
- [31] 沈寿,考释. 太极拳谱[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313.
- [32] [明] 毕坤. 浑元剑经[M]. 马力,汇编. 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下卷.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175.
- [33] 于永年. 大成拳——站桩与道德经[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295.
- [34] [东汉] 嵇康. 嵇中散集·卷二[M]. 摘藻堂四库全书·集部,曾锡宝,校. 何思钧,勘. 台北:世界书局,1984:1.
- [35] [五代] 沈约. 宋书·谢灵运传论注[M]. 萧统,编. 文选·卷五十,摘藻堂四库全书·集部. 吴向华,校. 台北:世界书局,1984:22.
- [36] 人民网. 习近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EB/OL]. [2017-12-21].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21/c40531-29721761-2.html>.

Rooting and Innovating: On Fundamental Problem of Classical Hermeneutics in Chinese Wushu

ZHANG Zhen¹, LI Xiu-hong²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Z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Luzhou 061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ultural confidence”, presented that wushu’s research should have classical spirit, studies must base on classics and speak with these. Wushu’s original classics is original and creativity substance which recorded and written for basic laws and disciplines of technique. It is a culture system which based on technique original classics and coexistent with cultural classics, historical classics, militaries classics, philosophies classics as it’s thought resources, hermeneutics methods and tools. Back to the original classics, can make Wushu will not be “aphasia” and “othering”. On the basis of these, making points “coexistence with Jin and attack-defense” meta-horizon, “coherent and intricate with Yin and Yang” meta-logic, in research of wushu’s classics, especially, amplified a method which “body-mind”、“body-knowing” interpret classics texts from Chinese hermeneutics: beginning with “words explanation”, going through “structuring gestures” “interpretation image”、“emerging meaningful”, approaching “bodily knowing Dao”.

Key words: original classics of Wushu; meta-horizon; meta-logic; meta-training idea; education of Wushu; communication of Wushu

本刊声明

《体育学研究》2018年第五期刊发了《聚焦“跨项选材”:我国运动员选拔培养路径的建设与反思》(作者排序:田麦久,刘爱杰,易剑东)一文,该文章系由田麦久教授、刘爱杰博士、易剑东教授三人围绕跨项选材主题,分别撰写代表各自学术观点的三篇文章组合而成。三人的撰文分别为:田麦久:《早期定向选材、跨项选材与转项训练》;刘爱杰:《跨项目发展是当代世界竞技体育的“常态”》;易剑东:《应该充分尊重中国竞技体育的经验、规律、国情——关于“三跨”的思考》。

因三位作者学术观点相对独立,为方便读者区分各自学术观点,避免混淆,特此声明。